

苦难与坚强

彭玉龙 著

苦难与坚强

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战争

关于苦难，那些震撼人心的细节与数据
关于新生，那些历经苦难而巍然屹立的根与魂

湖南人民出版社

苦难与坚强

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战争

彭玉龙 著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难与坚强：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战争 / 彭玉龙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 12

ISBN 978-7-5561-2033-8

I. ①苦… II. ①彭… III. ①抗日战争史—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K26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1323号

KUNAN YU JIANQIANG YICHANG GAIBIAN ZHONGGUO MINGYUN DE ZHANZHENG 苦难与坚强——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战争

著 者 彭玉龙
责任编辑 黎晓慧 龙妍洁妮
装帧设计 罗四夕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印 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2033-8
定 价 48.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作者简介

彭玉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研究员，从事军事历史研究 30 余年，先后参与《中国抗日战争史》等多部国家和军队重要课题的研究与编著；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成果《中国抗日战争史》与《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专家组、课题组成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参考消息》《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文章 100 余篇，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报刊理论文章一等奖等奖励。

◆ 1 苦难篇

一、近代中国苦难之源 / 005

（一）近代中国的沦陷——资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 / 016

（二）甲午对决的惨败——封建主义的腐败落后 / 026

（三）近代日本的野心——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 / 035

二、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 / 044

（一）血腥的屠杀和野蛮的轰炸 / 045

（二）违法的生化武器战和活体人体试验 / 048

（三）肆意掠夺中国的资源 / 049

（四）残害中国妇女的暴行与“慰安妇” / 051

（五）实行奴化教育，肆意摧残中国文化 / 052

◆ 2 觉醒篇

- 一、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与觉醒 / 057
- 二、近代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斗争和初步觉醒 / 062
- 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历史使命 / 074
- 四、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 / 093
- 五、中华民族的普遍觉醒 / 103

◆ 3 抗争篇

- 一、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 115
- 二、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 / 141
- 三、全民族的抗战 / 153
- 四、东方主战场 / 163

◆ 4 新生篇

- 一、从战败国到战胜国 / 185
- 二、从无地位之弱国到反法西斯大国 / 192
- 三、从旧中国走向新中国 / 201
- 四、从睡狮到醒狮 / 213

后记 / 229

1

苦难篇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但是，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面对苦难，中国人民没有屈服，而是挺起脊梁、奋起抗争，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行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史诗。”^①

读懂中国首先必须读懂中国的历史文化。

在人类文明史中，曾出现过许多古老的文明国家，如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希腊、古罗马等，这些在金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产生的古老文明，无不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断裂以致消亡，其文化共同体的延续均为外力所中断而没能直接留存下来，而只有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其文化从未被外来力量所中断而一直生存并绵延发展至今。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夏商周至18世纪中叶清中期，中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中断、一以贯之并延续至今的国家。古代中国曾以世界上头号富强大国的身份“独领风骚”达1500年之久。古代中国的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盛世有两个重要标识：

一是幅员辽阔，物产富饶。

从汉武帝始，古代中国的疆域版图就已经很辽阔了。唐朝盛世时的疆域版图为 1000 多万平方公里。元世祖忽必烈开辟的元帝国，其疆域版图逾越汉唐，达到古代中国的最大值，面积约为 1500 多万平方公里。清康熙年间设立台湾府，使古代中国疆域版图最后定格为 1300 多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和南海诸岛。清帝国中央政府对各地的管辖权和控制力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大值。据记载，到 1840 年，中国已有 4.1 亿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 1/3）和 1300 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在当时，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领土面积第二，仅次于沙皇俄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这样描述：“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土，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面。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①

二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特别大。

古代中国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祖先们对农业的投入最多，成效也最大，农耕技术的不断改进与积累，水利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既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也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16 世纪末，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还保持在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手工业的发展在古代中国也是比较突出的。丝、棉、麻纺织业和陶瓷业、竹木业、榨油业等都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许多产品远销海内外。

最令炎黄子孙引以为豪的无疑当首推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作为精神文明发展创造的必要前提，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尽管如今计算机的文字处理技术已经使毕昇的活字印刷术黯然失色，但毕昇在人类印刷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替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1 页。

代的。况且，造纸术的功用至今还是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手段所无法替代的。火药的使用在摧毁欧洲中世纪封建城堡乃至整个欧洲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举世瞩目的作用，而欧洲的火药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至于指南针的制作技术传入欧洲后，欧洲人用于航海，特别是用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乃至频频出击的殖民掠夺。此外，中国的天文、数学、冶炼、医学、造船等方面的科技水平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都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从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出发，经过中西对比得出结论：古代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①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商业与对外贸易的繁荣提供了条件。17世纪前后，虽然明清两代统治者实行海禁政策，但对外贸易还是有所发展，中国的货物不仅销售到周边邻国，而且远达非洲、欧洲和美洲。

绚丽多彩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智慧。自成体系的官僚政治、典章制度、价值观念等都与作为主体的传统农业经济相呼应，也曾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国力强盛提供了保证。

公元7—13世纪，即唐、宋两朝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直到18世纪末期，中国的经济规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据英国的安格斯·麦迪森统计，清王朝的GDP约占世界的1/3以上，居世界第一位，相当于20世纪末期美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上的比重；且对外贸易长期出超，当时西方国家中最富强的英国销往中国的商品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中国卖给英国的茶叶一项；全世界5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当时共有10个，中国就占了6个。毛泽东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

^① [英]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板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①

一、近代中国苦难之源

读懂中国的历史文化，就要读懂中国的近现代史。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多年间，由于落后、落伍，世界上几乎大大小小的强国，都侵略过、掠夺过、欺负过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堪回首的深重灾难。这段悲惨的历史，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和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成为刻骨铭心的国家耻辱、国家记忆。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口众多，山河壮丽，曾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当历史步入近代时，中国却落伍了！

17世纪中叶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国家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在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下迅速强大起来。资产阶级经过血与火的原始积累和殖民掠夺，“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②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加紧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正如列宁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6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①

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既改变了英国，也改变了世界。英国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成果，用新式炮舰和廉价物美的商品开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便于掠夺原料、劳动力和倾销商品的殖民地。英国本土面积仅有24万多平方公里，及至19世纪中叶，所占殖民地多达近2000万平方公里，多出英国本土面积90多倍（最多时达150倍左右），所谓“日不落帝国”便由此而来。于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曾被马可·波罗描述成金瓦盖屋、金砖铺地的中国，自然成为西方列强垂涎和争夺的目标。

然而，清王朝统治者此时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仍然自诩为“天朝上国”，将中国以外的国家一概视为“夷、戎、蛮、狄”^②，把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视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自身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全面滞后，却又虚骄、傲慢、冥顽不化。“当欧洲还笼罩在黑暗的阴霾之中，中国官员就已精神抖擞，乘着装有指南针的轻便马车到各地去参观装置有固体燃料探究火箭的一些天文研究中心。一千年之后，欧洲科学家正在发动工业革命时，中国官僚却还在迈着固有的方步。相形之下，他们已经不再那么精力充沛了。”^③“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④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颓势愈加深，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动荡，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

中国同其他国家和民族很早以来就有了接触和交往。由于地理的关系，中国同四邻亚洲国家和民族发生关系最早。自上古以来，中国和朝鲜、越南、缅甸、日本等，就有密切的交往，建立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虽然，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7页。

②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称，指居住在“华夏”四周的部族。明清之际，又把来中国的外国人称为“夷人”，于是有“红毛夷”“白夷”之称。鸦片战争期间和战后，中国将外国人仍称作“夷”，如“英夷”“法夷”“米夷”等。

③ [美]戴维·博达尼斯：《为什么现代科学在中国不曾发展起来》，载《国外社会科学》，1980（1），第7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页。

在长期的交往中，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封建统治者之间也曾发生过战争和政治纠纷，但总的来说，古代中国和四邻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主要内容是人民之间和平的商业和文化交流。中国发达的封建文化促进了四周邻国的文化发展，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中国也不断从这些国家吸收它们的文化上的成就，从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内容。

中国的对外关系到了16世纪后才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在此以前，由于地理上的阻隔，中国和西方国家几乎没有直接的交往，只是有一些旅行家、传教士和商人的个人来往活动。15世纪末，欧洲人追求黄金和东方商品，促成了地理大发现，东西方交通因而发生了变革，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从而加速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16世纪后，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开始汹涌地向东方泛滥，越来越多的西方冒险家、商人、传教士来到东方各地进行侵略活动。代表他们利益的国家和政府也开始对亚洲各国推行侵略政策，妄图把整个亚洲变成它们殖民扩张的园地，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封建中国，就成为它们的一个主要的觊觎目标。这样，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情况便逐渐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代替了亚洲国家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对象；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活动代替了中国和亚洲国家间的和平的商业和文化交流，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

16世纪时，世界的海上霸权分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西印度群岛、北美洲、南美洲（巴西除外）、太平洋群岛直到菲律宾都属于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巴西、非洲、好望角以东菲律宾以西各地属于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所以，最早伸张其殖民势力于东方的西方国家是葡萄牙。

1516年，葡萄牙驻马六甲总督就遣使来中国要求通商，这是近代欧洲人到中国之始，此后葡萄牙人来中国的日多。葡萄牙人最初所至的地方有广州、漳州、泉州和宁波等地。据《明史·佛朗机传》（当时人称葡萄牙为“佛朗机”）记载，他们的行径是“剽劫行旅”“掠卖良民”。葡萄牙人的海盗行径激起了当时人们极大的愤慨。如给事中（明朝监察官官名）王希文在奏疏中说他们是“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①。明朝政府对这些不法的

^①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第11页。

葡萄牙人曾多次使用武力驱逐。

在广东，葡萄牙人使用卑鄙奸诈的手段窃据了中国的领土澳门。葡萄牙人在广东开展贸易时，明朝皇帝原来特许的通商地点仅限于香山县附近称为浪白澳的一个小岛。1535年，葡萄牙人贿赂广东官员代为向明朝廷申请到澳门停船贸易，从此他们就从浪白澳移至澳门海面。1553年，葡萄牙人又借口要曝晒水渍“贡物”，请准他们在澳门上岸，到1557年他们就在岸上定居下来。最初，他们甚至不纳地租，只对广东海道每年贿银500两。1573年，海道受贿之事被人揭发后，于是改贿金为纳地租。澳门就这样被葡萄牙人所盘踞，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领土上所建立的第一个侵略基地。继葡萄牙人之后和中国发生接触的欧洲人，还有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殖民者。

16世纪末，海上霸权渐从葡、西两国转移到荷兰和英国。1602年，荷兰人组织了规模宏大的东印度公司向东方发展。1604年和1607年，他们曾两次派船到广州，企图和中国朝廷发展贸易，但因葡萄牙人从中阻挠和明朝海禁严密，都未能达到目的。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船15艘进攻澳门，葡萄牙人竭力抵抗，荷兰人未能得逞，于是转向东北占据了澎湖列岛，1624年被明巡抚南居益以武力逐出。随后他们又占据台湾，到1661年被郑成功以武力逐出。

英国于1600年已组成东印度公司，致力于与印度和南洋各地的贸易。对于中国，因为有鉴于荷兰在澳门的失败，暂时采取了观望政策。1635年，英王查理一世和少数资本家组织了一个“库尔登会社”，专营中英贸易。1636年派威得尔带领大小船只5艘到中国，于1637年驶抵澳门。由于葡萄牙人的阻挠，威得尔在澳门不得要领，便径向广州虎门驶进。中国虎门炮台守军予以阻止，威得尔竟使用武力，占据了炮台，烧毁了一个村庄。明朝官员终于答应威得尔做了些买卖。这是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接触，英国殖民者和中国人初次见面便使用了后来所惯用的炮舰政策。

明末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种种海盗式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在早期，外国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到中国，都曾受到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优待。但16世纪以后，到中国来的欧洲殖民主义者的种种暴行使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得不改变了对欧洲人的印象。西方资产阶级作家高斯特也承认：“抢

掠、杀戮和武力的经常使用，这些就是欧洲对于中国商业接触开始时的特色。欧洲人是在配得上‘洋鬼子’这个称号时，才被加上这个不愉快的称号的。”^①

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先遣队侵入中国的，除了资产阶级海盗商人外，还有传教士。明末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中，最出名的要算耶稣会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了。1581年，利玛窦到达广东肇庆，在那里建立了教堂。后又至韶关传教，并经江西至南京，最后在1601年同另一耶稣会教士西班牙人庞迪我到达北京。明朝皇帝允许他们留在北京，不久又准他们购置土地，建立教堂，从此，天主教的势力便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天主教教士来中国传教者日多。

明朝末年正是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候，一方面有清朝崛起和倭寇侵扰的威胁，另一方面国家财政穷困，兵事废弛，当时明廷所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开辟财源和加强军事力量。利玛窦等人看到这种情形，纷纷提出富国强兵之策，借以博得明朝当局的信任。传教士不仅为明朝献计出力，并且还撰写了不少关于天文、数学、地理、物理、哲学的书籍，其目的是要培养出一一些能适合西方资本主义要求的人才，以利于扩展他们的势力。西洋学术的传播无疑是欧洲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一种辅助手段，但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1644年，清朝开始统治中国。这时东西方海上交通已经大开，世界历史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在这样的形势下，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对内统治，采取了限制中外交往的闭关锁国政策。

清朝初年，清政府严禁人民下海，其目的在于防止人民接洽台湾郑氏。1683年，台湾郑氏降清，次年康熙帝下诏解除海禁。所以，清初的海禁政策主要是对内而非对外。1692年，康熙帝曾下令允许人民习教，当时天主教士仍受清廷重用，而各国商人都还能在华南各口岸进行贸易。这时的清朝政府并没有明显的闭关排外倾向。

到康熙晚年，随着中外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和人民反清起义的不断发生，在统治阶级中出现了一种害怕外国人和汉族人结合起来反对清朝的倾向。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帝诏谕中的一段话便流露出了这种顾虑：“海外如西

^① 胡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学习杂志》1950年，第3卷，第11期。

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又汉人人心不齐……朕御临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①1717年，兵部等衙门遵从清帝的指示，会同边疆大吏建议禁止商船到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噶喇吧（今爪哇）等处进行贸易，但东洋贸易（指和朝鲜、琉球、越南、日本等国间的贸易）仍可照旧。这是闭关政策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政策自始即以西方国家为对象，并非不加区别地对一切外国。

这种闭关排外的倾向到雍正朝时有所发展。雍正二年（1724），清廷下令禁教并没收天主教在各省的教产。1727年，又下令：粤闽洋船出入限在厦门和虎门两处。但是，清廷闭关政策的真正确立，应该说是18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一方面，由于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加紧了对外追求市场的活动，来华的欧洲人日渐增多，他们的海盗行径也越来越猖獗；另一方面，乾隆中叶以后，清朝的政治日益腐败黑暗，国内人民反清运动持续发展，所以，为了防止外国人的侵扰，更重要的是防止汉族人和外国人结合起来反清，从18世纪中叶起，陆续出现了种种限制中外往来的规章制度。

1757年，清帝下令，限定外国人只可到广州一地进行贸易。1760年，又在广州成立所谓“公行”，一切对外贸易由组成公行的指定行商垄断经营，不准行商以外的私商参与。公行又是外国人和中国官府间的中介，外国人和中国官府间的一切交涉往来，都要通过行商来办理。

此外，清朝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防范外夷”的条例。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皇帝，经批准后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五条：（1）外商只能在规定贸易期（五月至九、十月间）在广州居留，到期必须随船回国，或去澳门；（2）外人到粤只准住在行商馆内，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3）华商不得向外商告贷，外商雇用华人只限通事和买办；（4）外人不得雇人传递信件至内地；（5）加强河防，监视外船行动。这些规章以后在嘉庆、道光年间屡经重订，其基本精神始终是要限制外国人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交接往来。

由上可见，清朝政府采取闭关政策主要是出于维护其封建统治秩序的政

^①《东华录》（康熙九十八），第22页。

治动机。这一点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毫无疑义，17世纪末叶在对华贸易上彼此竞争的欧洲各国间的纷扰倾轧，曾给满洲人所采取的排外政策以一种有力的帮助。但是更主要的，乃是由于这个新王朝的疑惧，它惟恐外国人会支持大部分中国人被鞑子征服后大约最初半世纪所存在的那种不满情绪。”^①另一方面，清政府之所以有可能推行这样一种对外政策，是由于当时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质，外国的贸易来往对中国来说并非必不可少，实际情况的确如1793年乾隆帝给英王乔治三世信中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②所以，闭关政策正是适应于这样一种经济基础的政策，因而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自然发展不起明显的阻碍作用。事实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③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政策有它积极的方面：它是对16世纪以后欧洲海盗商人不法行为的一种合理的答复，具有一定的自卫意义。

正当清政府加强它的闭关政策的时候，中外贸易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18世纪中叶，在广州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西方国家中，在贸易额上没有一个是具有绝对优势的。但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后，情况便逐渐起了变化。

商品、鸦片、大炮和宗教，是西方殖民者扩张侵略以打开别国大门的四件法宝。19世纪中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就是沿着这一强盗逻辑频频叩击中华国门的。

英国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也是殖民者侵略中国的第一件武器。当英国商人得知古老虚弱的中国是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大国时，兴奋得眼睛发红，想当然地向中国运来了大批毛纺织品、睡衣、刀叉、钢琴、自鸣钟之类的商品，满以为可以狠赚一把。可事实证明，这是英国人的一厢情愿。因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中绝大多

① 马克思：《中国和欧洲的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② 《东华录》（乾隆一百十八），第3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